

《汉书·艺文志》的编撰及其特点

倪 晓 建

《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系依据《七略》改编而成,且有所创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它的产生,开创了利用官修书目在正史中编撰“艺文志”的先例。对于这类书目,郭沫若有中肯的评价,指出:“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①就《汉志》的编撰思想和内容特点作一探讨,对于总结中国目录学的遗产与传统,更好地发挥史志书目的作用,都有一定的意义。

《汉志》作为《汉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编撰体现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和方法。但是,就书目的基本体系以及主要内容,与刘向、刘歆的《七略》又有着直接的因袭关系。根据《汉志》的记载和《七略》的残卷佚文,刘氏父子等人编撰《七略》的过程是这样的:校勘图书;编写叙录;种别群书。范文澜说:“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光辉的成就”。^②《七略》的产生,为编撰综合性系统书目创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工作程序,它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个重要贡献。

一 《汉志》编撰的指导思想

《七略》产生后不到一百年时间,班固写作《汉书》因《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在古典书目中又开辟一新的领域。班固在《汉书》中以《七略》来“备篇籍”是有其一定思想的。

首先,为《汉书》的写作思想服务。历史家写历史都有个思想目的,司马迁写《史记》,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写作《汉书》的目的,则是要在思想领域维护和巩固东汉的封建统治。而《七略》在编撰目的以及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上,与《汉书》基本是一致的。

班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目的,主要表现在创立断代史在思想上。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他出生在一个豪富并且有正宗家学传统的家庭,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七岁开始了纂修《汉书》的工作,受家学尤其是父亲班彪的影响很深,常常以为凭着“二世才术,位不过郎”而自论,恨自己生不逢时,“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③而自通,“天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章”^④,他要继承父志,重振祖业,在政治上就不得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思想上也就不能不尊儒。他创立断代史的体例,总结西汉一代的历史编成《汉书》,就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服务的。班固在《汉书》写作中,明帝曾暗示班固写史的立场,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夸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在临死的遗书中,仍念念不忘“颂述功德,言封禅事”,这才是忠臣的榜样,比司马

迁好的多^⑥。这番谈话的用意，班固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要“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来“光扬大汉”，写一部尊儒宣汉的史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西汉末年，成帝任命刘向等人校书编目，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及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宣帝亲临决断之后，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加强学术思想控制，巩固封建统治采取的又一措施。对于刘氏父子受命完成的这项工作，班固是很看重的，不止一次地在《汉书》中提起，“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杨雄谭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闾，究先圣之壶奥”。^⑦这是谈《七略》的历史作用和儒家思想，也含有自己依《七略》“备篇籍”的原因。《七略》在分类上按照封建皇帝进行统治的需要来排列次第，思想本质反映了皇权思想；在评论中把六经说成本，把诸子等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另外，《七略》说《易》为五经之源，与天地共终始，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这种神学思想，也正是班固要在《汉书》中说明的“汉承尧运”，“协于火德”的观点。由于思想观点上的这种关系，班固不仅以为《七略》只是“及时君之门闾”的工具，而且尊称为“纬六经，缀道纲”的经典。在思想上，符合他写作《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尊儒宣汉的需要；在时间上，也基本合乎《汉书》“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的断代。所以他把《七略》删入《汉书》，以重其说，为“论大道”，“先六经”的正统史学思想服务。

其次，述文化学术史的思想。班固编撰《汉书》掌握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他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董仲舒传》中说：“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贾谊传》：“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者著于传”。由此可见，班固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为了“切于世用”。《七略》的编撰者刘向、刘歆父子，

在班固的心目中是博学的榜样，他们“其言其切”，“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⑧是最“切于世用”的。所以，在《汉书·五行志》中采用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刘歆《洪范五行传》七十三条；《汉书》的其他部分对刘向《新序》《说苑》等也多采用。班固利用刘氏父子的著述写史，他说：“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⑨说明他的思想是刘氏父子思想的继承。需指出的是，班固在《五行志》中继承了刘氏父子的神学观点，而在《艺文志》中则继承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七略》的继承，在史学上是个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在于班固创立了史书中记述文化学术史的体例。

《汉书》中的十志是从《史记》八书取法发展而成的。在文化学术方面，《史记》没有专设篇目，只是在《自序》里转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论述了汉初诸子的学术状况；《儒林传》虽说是一种学术史的体例，但也只是就经学的家别传授作为叙述内容。这些记述不过是文化学术的一部分，既不系统，也不全面。而汉代在文化学术上是很有特色的，除经学及诸子外，史学、文学、军事和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对于这些方面的文化成就，刘向等人在整理图书时都作了系统的叙述和总结。在当时，《七略》的形式已成为学术史的主要表达形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利用《七略》的成果加以改编，用“备篇籍”的方法来反映文化学术史，条件是成熟的。对于《七略》的学术史性质，班固在《艺文志·序》和《叙传》中表露出自己的认识。这两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图书和学术兴衰的原因；二是刘向司籍的作用；三是“备篇籍”的意图。他既讲了图书文化的简单发展过程，也论述了图书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说明了“爱著目录”，不仅是为了发展学术，使孔子的“微言”、“大义”弘扬光

大,而且也是为了反映文化学术史。班固作为两汉之际史学上的代表者和总结者,把作为学术史形式的《七略》编入《汉书》,对《史记》记述学术源流的工作是个发展,在这方面体现了班固的创新和成就。

第三,保存古代藏书的目的。班固的家世和他的一生与图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伯祖班固与刘向共校秘书,并得到皇帝的赏赐,得到不少秘书副本。到他父亲时,由于家中有这些赐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班固本人从受诏校书到著书立说,都在与图书打交道。他在写作《汉书》的同时曾编有《东观新记》、《仁寿阁新记》、《兰台书部》和一部资料目录。在当时那种书籍制度历史条件下,又因自己的切身经历,对图书的作用和刘向校书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他在《叙传》中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里不仅是说自己著书的目的,也是谈图书的传世作用。在《叙传》的《艺文志》自述中,班固也谈到图书及刘向司籍的作用,他称赞刘向是孔子之后第一个有功于图籍的人。这里既是对孔子、刘向的赞颂,也是以继“刘向司籍,九流以别”,而述《艺文志》自况的。从历史上看,班固借书目保存图书的目的是达到了,邵晋涵说:“班孟坚《汉书》因刘子骏《七略》作《艺文志》”,而“西京书籍略见其梗概矣”。⑥

综上所述,刘向刘歆创体以来,班固是首先认识到《七略》的学术价值,并加以创新发展的目录学家。他的这一创新,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后来史志书目的编撰和补撰奠定了基础。

二 《汉志》的内容特点

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志》在体例上与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体

现了史志书目在编撰内容上的特点。就《汉志》的思想内容来说,既有‘因袭’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从历史上讲,无论因袭或是创新都有其积极意义。下面就在《汉志》与《七略》异同的基础上,来谈谈《汉志》的内容特点。

(一) 分类体系的基本内容

班固在《汉志》中因袭了《七略》分类体系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没有象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重创一体呢?这与分类体系的内容有重要关系。

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学术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受损失外,其他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汉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他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

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奉命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他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

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

再者，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首先，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关系。如《六艺略》除了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里，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其次，在类目排列上反映了学术门类的发展关系。《诗赋略》分为五小类，它先列先秦之诗，后排汉代之赋。其中最后《歌诗》一类全录汉代作品，反映了诗赋在古代的发展源流及作品体裁的异同。总的说来，《七略》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又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增添了因素。

（二）序文的编写体例

班固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但并没有完全继承它的书目体例，他把《七略》中论述各类学术源流得失的《辑略》，根据史书体例的要求，改编后各入其类。尽管文字上更易不多，但体现了班固在书目体例上的创新。

史书的体例基本可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年表和书志五部分，不过也有增分为论赞、叙例七部分的。^⑩论赞是写在每篇之后用以叙述或总结全篇内容要旨的文字，它较早的形式是“君子曰”（《左传》），“太史公曰”（《史记》），班固在《汉书》篇末把他的评论之辞皆称为“赞曰”，这在史书体例上是一个进步和贡献。在对《艺文志》的编撰时，也用史书的这种体例对《七略》进行改编，使论述有关大、小类的序文和各类图书归附在一起，

互相维系，不仅使《艺文志》的体例和史书作到了统一，也使书目更加条理清晰，为以后历代书目体例所效仿。

大、小类序在《汉志》中起着论辨和总结学术的作用，它的写作之精要，内容之广泛，为历代学者所称颂。《六艺略》的类序最为详尽。首先阐明经书的要旨以及一些历史情况；然后重点考究经传的师承传授和学术分布。在时间顺序上每部经书都是按照上古、春秋战国、秦、汉几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期叙述，重点又在汉代，这样的写作体例和内容，对于全面了解经学的历史和现状是有价值的。《诸子略》中的序文，是先秦以来诸子学术的全面总结。它的写作体例仿自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而有所发展。每家小序言简意赅，首先述明学派的起源，其次揭示学派的思想要旨，然后论述学派的思想得失。其他各类序文分别叙述其官守渊源和学术成就，文字较为严谨。对于《汉志》中的序文，古今都把它看作是“最为明道之要”的精华部分。如果说《汉志》的类别还只是部次了文化学术门类的大势，那么这些类序则对每个门类作了进一步专深的论辨和总结。保存至今，成了我们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珍贵文献。

（三）著录上的调整与补充

班固编撰《汉书》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但又不照录原文，而是进行整理加工，创新补充。他的这样编撰方法表现在《汉志》中，则是对《七略》“删其要”时所作的“精确考核”，使之与《汉书》“首尾洽通”，系统全面地著录了西汉藏书。

关于“出”、“入”、“省”的加工。刘向、刘歆等校书编目，以当时的图书和学术门类设目立类，著录图书，班固对此似不必一一过目考核就可以转录进《汉志》中去，其实不然，他仔细核对图书的内容和类别，对一些图书的类属重新作了“出”、“入”的调整以及删“省”的加工，并对这些变更给予注明，表现了在著录上与《七略》的不同。所谓“省”，

就是对一些重复著录图书的删省，这个问题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它涉及到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问题。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汉志》中确有类似我们今天所说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出现不是自觉的，而是当时书籍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

关于几部图书的补充著录。班固在《汉志》中表现出的另一创新精神，就是在断代史学思想指导下对《七略》著录未尽图书的增补。所补刘向、杨雄、杜林几家图书，虽然还不能弥补《七略》成书后近三十年的著述，但所表现出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积极的。

关于“首尾洽通”的著录编次。《汉书》是断代体例，而在《艺文志》中却表现出记古今通代图书的内容，《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两者在内容体例上是不是有些矛盾，对此有人表示质疑。实际上《汉书》十志和《古今人表》的内容都不限于汉代，这样的编写目的，是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⑩使其上下联贯起来，便于了解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所以班固对《七略》改编时没有删除汉代以前的著述，而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给予全面的著录，时代相续地反映图书文化的历史。

《汉志》在著录编次上的特点，首先按照图书的时代先后排列，其次是以学术的发展源流。尽管一些图书在著录上有些杂乱，但就书目的整体而论，图书文化的先后，学术思想的流别，还是能够分辨清楚的。《汉志》的这种著录图书的方法，在我们今天书目的编撰中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注语的思想与内容

班固《汉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对《七略》“删其要”时所表现出的博洽，他把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结合史书其他部分的编撰来完成。古人一向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一般说志贵在博而约，是较难写作的，班固《汉志》采取寓繁于简的形式，对《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加上

简单的注语，既较好地完成了文化学术史的任务，也作到了与史书体例的统一。班固所加注语，内容广泛，文字精要。第一，注明“有列传”，使《汉志》与史传联系起来。《诸子略》儒家，《晏子》八篇下注曰：“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注明《史记》中有列传的注语有十一处，虽然对图书作者有列传的没有一一注明，但已指出“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的“详略互见之例”。^⑪根据这一注语的旨意去参阅有关列传，不仅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倾向，同时也能得到作者的整个著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刘向叙录的作用。第二，注明图书缺佚真伪，确定图书价值。《七略》成书后，新校定的图书又遭战乱的损失，班固从目录学的眼光对一些亡缺图书作了说明。《六艺略》小学类《史籀》十五篇下注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关于图书的真伪，班固从不同角度给予注明。一是从内容上说明的，如《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一是从时代上考证的，如《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一是从语言文字上着眼的，如《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第三，注明图书内容性质。《高祖传》十三篇注云：“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又如《议奏》三十九篇注云：“石渠论。”第四，注明图书作者。《凡将》一篇注云：“司马相如作”；还有从作者时代的角度注明的，如《封禅议对》十九篇注云：“武帝时也。”注语的范围从图书作者、内容以及真伪等各个方面给予说明，为读者的利用带来很大方便。这一方法开创后，在《隋书·经籍志》等史志书目中得到了继承。但是，注语又很不全面，《六艺略》、《诸子略》较详，而在《数术略》、《方技略》中甚至一个注说也没加，反映了班固在著录图书上的偏见。

（下转第90页）

列九流百氏之学……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章学诚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理论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书目中类序、提要、著录款目、分类、互著别裁等方法的重要作用，大大提高了书目的价值和目录学的作用。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高峰。直至步入新目录学之前，古典目录学家所做的工作都只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发挥和解释，实践和应用，很少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

注释

-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 ② 郭沫若《卜辞通纂》
- ③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
- ④ 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 ⑤⑧⑪⑫ 班固《汉书·艺文志》
- ⑥⑨ 《文选》李善注引《七略》
- ⑦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 ⑩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 ⑬ 李笠《目录之名称及其内涵》
- ⑭ 刘纪泽《目录学概论》
- ⑮ 鲍鼎《目录学小史》
- ⑯⑰ 郑樵《通志·校讎略》
- ⑱ 胡应麟《少师山房笔丛》
- ⑲ 费自珍《定庵文集》(续集)
- ⑳㉑㉒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 ㉓㉔㉕ 章校诚《校讎通义》
- ㉖㉗ 阮孝绪《七录序》
- ㉘ 张西堂《论目录之体例》
- ㉙㉚ 朱彝尊《曝书亭文集》
- ㉛ 孙诒让《稽古述林》
- ㉜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 ㉝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
- ㉞ 许寿堂《亡友鲁迅印象记》
- ㉟ 刘昫《旧唐书·经籍志》
- ㊱ 《唐会要》卷六十四
- ㊲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
- ㊳ 《玉海》卷五十二
- ㊴ 杨诚斋《遂初堂书目序》
- ㊵ 王芑孙《陶陶室记》

(上接第 95 页)

朱彝尊在《经义考·著录篇》中评论说：“班固《汉书》依《七略》作《艺文志》，诚良史之用心，而史家体例之不可少者也”。《汉志》以后，正史中以例编撰《艺文志》(或《经籍志》)的有六种，清代以来对史书缺《艺文志》的作了补撰工作，往往一部史书就有好几家；据统计，这类补撰的史志有五十余家，在目录学领域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丰富的史志书目为我们了解历代图书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就《汉志》的学术价值而论，首先表现在对先秦以来所有的图书进行了整理编次，使杂乱的古今图书从此有了一本清册，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图书的一些情况，全凭它的著录和启发。其次，它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把当时的图书系统清晰地著录在类表里，通过这幅分类表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末年以前整个文化

学术的概况。另外，它在著录部次图书的基础上对文化学术的各个门类分别给予评论，尽管其中夹杂一些阴阳五行的术语，但基本上已脱离了神学的轨道，而就具体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这些评论和总结，可作为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依据。

注释：

- ① 郭沫若《就当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见《光明日报》1959年4月8日。
-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 ③ 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
- ④⑥ 班固《汉书·叙传》。
- ⑤ 班固《典引叙》，见《文选》卷四十八。
- ⑦⑧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 ⑨ 邵晋涵序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 ⑩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编。
- ⑪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 ⑫ 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三》。